

■新作聚焦 水运宪长篇小说《戴花》:

书写历史,也是对话历史

□孟繁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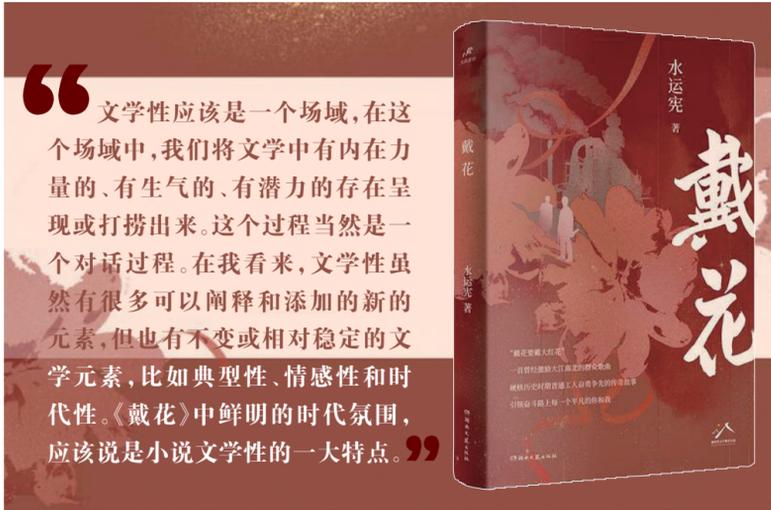
我对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一直有极大的阅读兴趣,主要的原因是这个领域非常难写。当代文学70多年,可能只有“乔厂长”一个时代,其他时代的文学几乎没有工业题材的份额。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个题材难写的程度。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水运宪创作了中篇小说《祸起萧墙》。小说甫一发表便引起强烈反响,水运宪和他笔下的人物傅连山,发现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篇小说也使那时引领文学风潮的“改革文学”一改人物的“强势”或“超人”模式,在丰富和扎实的现实生活中,表达了新时期工业题材进入文学纵深的可能性。这一点,水运宪是有文学史贡献的。

《戴花》是水运宪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讲述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国现实的作品,其写作难度是可以想象的。但读了这部作品之后,我还是被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所打动。小说写这个年代一群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德华电机制造厂学习实践。按照当时的政策,无论他们学的是什么专业,一律要下到车间当学徒工。主人公杨哲民被分配到翻砂车间熔炉班,成为车间老工人莫正强的徒弟,也成了一名劳动强度最高、危险最大的炉前工。莫师傅文化不高,大大咧咧,几乎“乏善可陈”;一个大学生成为一个大老粗的徒弟,杨哲民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杨哲民发现师傅并非等闲之辈,他外粗内细,为人善良;再相处一段时间后,杨哲民又发现,莫师傅不仅主观武断,而且争强好胜。他内心里真正想要的,是戴一朵大红花。在劳动节的晚会上,他倾情演唱《戴花要戴大红花》,唱得热泪盈眶,甚至感染了所有的人,台下一千多人一起合唱。莫师傅也一样,他刚见到杨哲民时喜欢得不得了,“民儿民儿”地叫着,甚至请他到家里吃饭,倒是莫师傅看出了些端倪:收一个正规的大学生做徒弟,说不定哪天就打你的翻天印——“翻天印”就是徒弟造了师傅的反。莫师傅喜欢杨哲民是真实的,他忌惮杨哲民打他的“翻天印”也是真实的,他甚至情不自禁地想过,杨哲民“你到底是革技术的命,还是革我的命”?他怕的是杨哲民赶上自己,成为劳模。于是,他甚至在他成长道路上设置障碍。他们是师

徒,但也是对手。在这对师徒身边还有各种不同的人物,有同学之间产生的情感关系,有陷入不可理喻的复杂纠纷等。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但对于杨哲民、姜红梅们来说,那是一段挥之难去的青春岁月,也是充满了理想和激情的过去。《戴花》主要故事展开的空间并不大,基本是在一个车间里。但对小说来说,这个车间就是一个“小宇宙”。在这个“小宇宙”里,“戴花”是响彻时代的主旋律。但是,水运宪仍警醒地说,他的小说不是要向年轻人传递什么“精神”,尽管那个时代已经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他就是要写好故事,写好故事里的人物。

应该说,小说主人公对职业精神的专注、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以及人与人之间基因复制般的真心相爱,也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和共鸣,这一点,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它的价值。特别是小说结束时,当杨哲民从市劳模会上回来,他第一时间就去了师傅莫正强的墓地,将自己身上的绶带和大红花一起系在了墓碑上,师傅让毛妹子将印有劳动模范的搪瓷缸子和白毛巾也都放到墓碑底下。用荣誉祭奠一个真心念念不忘当劳模的师傅,是所有人对莫正强的尊重,也是小说体现出的最鲜明的时代性。

最近,批评界在讨论文学性的问题,这非常重要。虽然文学性从乔纳森·雅各布森都没有说清楚,而且至今仍是一个不明之物,但是,文学性肯定是存在的,就像现代性、历史性、音乐性、戏剧性等一样。文学性应该是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我们将文学中有内在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呈现或打捞出来。这个过程当然是一个对话过程。在我看来,文学性虽然有很多可以阐释和添加的新的元素,但也有不变或相对稳定的文学元素,比如典型性、情感性和时代性。《戴花》中鲜明的时代氛围,应该是小说文学性的一大特点。上世纪60年代已经是遥远的历史,如何书写或还原时代氛围,是对作家的一个极大的挑战。水运宪虽然是这段生活的亲历者,但是,讲述话语的年代,毕竟不同于话语讲述的年代。特别是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那段历史被各种叙事描摹



得色彩斑斓,油画般地涂抹了无数层色彩,这一“历史化”过程也一定会影响到作家的思绪和立场。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水运宪在最大程度上保有了他对那个年代的原初记忆。这个时代氛围是在会场、车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物件、奖品、饮食、衣着、节庆中得到呈现的。那个时代存在着极大的问题,改革开放就是对那些问题的修正。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对那个时代生活的反映、表达,对作家来说同样义不容辞。这也正如水运宪所说:“戴花要戴大红花”,这句话反映的正是那个年代人们万众一心、奋勇争先的精神气质。虽然历史不可复制,但那个时代的雄伟进程、人民大众艰苦创业的燃烧岁月、改天换地的豪迈气魄,永远值得激情书写。讲好那个年代生动鲜活、感人肺腑的中国故事,应该是一代作家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

在《戴花》的精细描摹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不同的生活面相。一方面,是莫师傅对杨哲民说的“一起进步”,不能说不诚恳。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师傅没有太深的心机,他只能用时代的流行话语表达他在“时代中”,

类似的场景或对话在小说中无处不在;另一方面,莫师傅与家人和其他人的关系,比如骆科长、姜红梅,特别是姜红梅对杨哲民的爱情,小说写得酣畅淋漓。或者说只要回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就是过去生活的自然延续,衣食住行依然如故。这又告诉我们,生活的观念是顽固而难以改变的。观念意义上的生活,只改变了生活的表面而不能改变生活本身。这是《戴花》的一大发现,也是小说的力量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水运宪的小说就是植根于生活的小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与其说《戴花》是书写历史的小说,毋宁说是水运宪是在诚恳地与历史的对话。



■创作谈

写完《戴花》这部小说,始终伴随着耳边的那首通俗歌曲《戴花要戴大红花》却余音缭绕,不绝于耳。我喜爱音乐,贝多芬、柴可夫斯基都是我心中的泰山北斗。但是我必须承认,驻留在我心中不可替代的“命运交响曲”只能是那首“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原因非常直接,在现实世界中,那首歌曲曾经实实在在地与我的人生命运交织在一起。此生此世,绝然挥之不去。

创作这部小说的初心发端于40多年前,却一直未能动笔。改革开放的进程十分迅猛,商品经济时代突如其来,文化的多元性被无限放大,难免让人困惑甚至迷失自己。艺术出轨于资本,娱乐化潮流强势碾压了文化市场,传统写作一度苟延残喘于边缘一隅。文学作品的社会责任与艺术的恒定价值,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质疑与挑战。所幸,自己的信念和定力不会也不可能改变,厚积于心的那些题材不仅没能淡忘,反而磨合愈加熟稔。在我看来,文学作品写得好不好至关重要,题材过时不过时的问题却并不重要。

回望刚刚过去不久的火红的年代,在一穷二白的日子里,万众一心奋勇争先的精神气质感天动地。那是一道民族复兴的钢铁脊梁,也是一段崛起时代的国家记忆。虽然历史已不可复制,但是那个时代的雄伟进程、人民大众艰苦创业的燃烧岁月、改天换地的豪迈气魄,永远值得我们激情地书写。讲好那个年代生动鲜活、感人肺腑的中国故事,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

我相信,从那个时代打拼过来的人,曾经的日子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而对于我们新时期出生的年轻人,那些峥嵘的岁月对他们来说难免陌生。恰恰因为如此,物质贫乏的年代、苦中作乐的生活、不甘后人的竞争、曲折多姿的情感等一切场景,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心中不可思议的人间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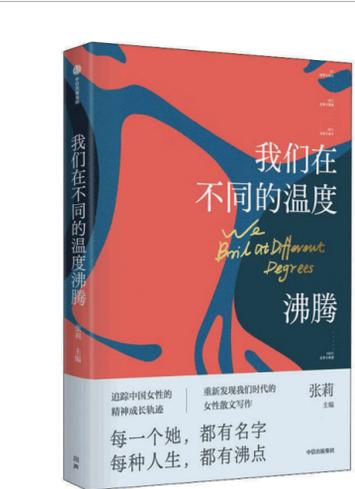
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当下比较稀缺,但我始终不认为是题材本身的问题。相反,我倒觉得这是文学写作的一大资源,是一座富矿。

工厂环境和工人群体的特殊性本身就具有种种神秘的色彩。用文学形式真实客观、灵活活现地展示,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读者而言,至少能引发好奇心,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鲜感,从而激发起不同程度的阅读兴趣。重要的是作品要有质量,把故事讲精彩、把人物写鲜活,所以我一直在朝这方面努力,但愿不负自己,不负读者。

当然,书写过去的岁月,不应该只是对自己的深情回望。把曾经深深影响过自己的种种感动传递给读者朋友共享,才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情。

不止是深情回望

□水运宪



■第一感受

致那些百感交集的沸点时刻

——读《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 □易彦妮

在《外婆遇到爱玛》里感受到人情味的珍贵;脱不花的《相亲记》以生动、诙谐的口吻讲述了相亲环节的诸多趣事,令人印象深刻;张天翼《欢情》以书卷气的叙述擦亮爱情的日常光泽;草白《带灯》写下老祖母对守护炉火的执迷;孙蔚麦《对岸》写下父亲临终前的场景……这些从情感经历里分泌的甘苦,令人念念不忘,它们如灯笼般悬挂在记忆深处,照亮前行的路。

奔赴辽阔之地,认出那些滚烫的风暴时刻,是“远游与故乡”部分散文的共同特质。在《我跳舞,因为我悲伤》里,冯秋子笔下的“我”和“我们”通过现代舞的韵律重新感受身体的舒展,遥望心意的连通;绿妖《我曾遇到这座城市的青春》写下异乡人的孤独感和深夜里热烈聚餐的情景,那是北漂青年从夜晚认识北京这座大城的时刻;异域海啸的经历,让张悦然在《月圆之夜》看到异国青年男女的别样生活,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之间的隐秘关系,生发出写作的责任感。不止于空间意义上的位移,远方意味着一个致力于不断完善自我,意味着“凿掉自己身上的壁垒,一点一点,去亲近那些有光泽的灵魂”(张莉语)。面对流言缠身的苏乎拉,李娟《苏乎拉传奇》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这位美丽少女的温情视角;感受到山河的隐秘召唤,林白来到湖北各地,在《湖北各地遇见的妇女》记下农村妇女们生机勃勃的生活碎片,倾听来自泥土的朴素、多汁的声音……从陌生的风景中获得别样的感悟,重要的是踏入那隐秘而风光无限的世界,勇敢地伸出触角,在那些来自大地、山川、湖海的故事里,重新认领美与力量。

当温度逐渐攀至沸点的高数值,所见到的是与生活短兵相接、历练辗转之后的沉淀结晶体。“生存与希望”部分收录的四篇散文,按照着那些居于幽暗之处的女性生存样态。无论是农村女性在漫长岁月里默默守望相念(行超《回头的路》),还是对女性生育甘苦的体验(叶浅韵《生之门》),当故事里的女人们开始说话,这些声音如此可贵——它们显示了那些沉默的女性群体的真实感受、主动选择,一一确认她们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曾是“女工”的郑小琼,致力于在《女工记》里不断淘洗出一位具体可感的“女工”们,写出机械化时代的工人的疼痛和困惑。在《吴桂兰》里,梁鸿写下一位小镇“网红”的日常,她一边扫街一边跳舞,努力以自己的存在抵抗被遗忘的困境……这些散文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大众文化中的女性刻板印象,让我们看见那些不容易被看到的女性生活,看见她们的生命

的光泽和斑驳。以“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为题,这部女性散文选为不同生命的沸点时刻提供了一种彼此伸展、互相连通的可能性。它们一起潜入心底,有如风暴席卷,让读者欢欣、沉默或落泪。在书中,这些从四处汇聚而来的女性之声,多么像一棵棵树!不同身份的女性写作者诚实地写下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思,更重要的是,她们主动俯下身来亲近大地和泥土,努力扎根,努力活得丰盛。由于坦率的书写,也由于不断敞开心扉,这些从各自生命里长出来的故事具有朴素、动人的力量,它们伸出的枝桠也在互相衬托中增强了彼此的蕴致。

早在现代文学发端之初,散文这一文体便与新媒介保持良性互动,以灵活、敏锐的姿态介入当时的文学现场。冰心笔下典雅、清丽的散文在发表之初便收获了热烈反响,这一现代女性散文典范的最初生成是置于广阔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当年,冰心正是以“女学生谢婉莹”署名的“问题小说”登上文坛,开启写作生涯。随后,从丁玲、萧红、张爱玲到上世纪90年代的女作家们,她们各具神采、各有特色的写作拓展了女性散文的情感空间与审美样态。细细体察《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一书会发现,无论是写作技法的隐秘变化,还是向更多普通女性写作者敞开的身份构成,近20年来女性散文写作的新变实际上也指向了那沉潜于水面之下的、不断充盈的现代情感审美空间。这有力地呼应了编者张莉提倡的“新女性写作”：“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今天,新媒体的勃兴为散文写作提供了更加多元的传播平台,不同年龄、身份、地域的普通女性拥有更多机会提笔写作,她们更为芜杂的女性之声、自由自在的书写姿态,共同构成了推动当下女性散文发展的重要向度——就像本书主编张莉期许的:“当越来越多的女性拿起笔,当越来越多的普通女性写下她们的日常所见和所得,那是真正的女性写作之光,那是真正的女性散文写作的崛起。”当更多女性是在书房、咖啡馆、公园、厨房、工厂等地纷纷拿起笔写作,写下日常的光泽,写下芸芸众生之时,属于当下时代的“女性气质”和“女性形象”正在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之时,一个多声部、多维度的女性情感共同体将会生成,一个新的女性散文写作时代将会真正来临。

■短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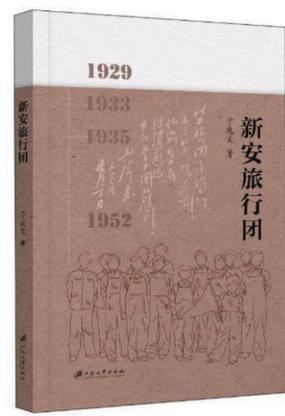
历史天空的回响

——读于兆文长篇报告文学《新安旅行团》 □周 轶

于兆文的新著《新安旅行团》是一部全景式反映新旅历史的长篇报告文学。40余万字的体量,真实再现了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新旅小战士们从抗日救亡到新中国成立的战斗历程和艰苦卓绝的生活。从文本和整个框架上来看,它是“质文互映”的。所谓“质胜则野,文胜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用在《新安旅行团》这里特别恰当。面对大历史、大时空、大视野,考验着一个作家构思创作时的大局意识以及对史料、素材、人物、语言以及情节、细节、矛盾冲突等各个方面的掌控能力,有如指挥千军万马。于兆文有这种能力,所以,他很好地驾驭了这个复杂的历史题材。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卷帙浩繁,史料芜杂,要从其中理出头绪、架构思路,精力耗费之大前所未有”。

这部书以时空为经纬,在时间上,从新安小学诞生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长达17年;空间上足迹遍及22省市,行程五万余里。时空跨度之大,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写作难度。可贵的是,这部作品的文学描写十分丰盈,可以称得上绚丽多彩,达到了质文互映、相得益彰的效果。从框架上看,没有花里胡哨颠倒倒去的编排,没有辞彩艳丽夺人眼球的标题,很老实、很朴实,但其中的内容、文字灵动多变,这跟它外在“老实相”的框架恰成对比,给人带来新的文体验。合理的想象与大量丰富的史料相结合,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比如新安小学颇有荒诞的诞生过程,比如新旅在行军途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如何克服、如何坚守、如何绝处逢生,读来都让人感觉真实诚信。此外,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的鲜活人物形象,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比如,忠孝不能两全的新旅灵魂人物汪达之,国人敬仰的中国现代教育先驱陶行知先生,还有很多新旅小团员,众多可亲、可爱、可敬的人物,增强了作品立体感和感染力。《新安旅行团》用文学的语言讲述了一段壮阔的历史,一段鲜活的历史,一段足以激励后人并光耀千古的历史,我想它也是一曲动人的爱国的弦歌。

新安旅行团的小好汉们来自于新安小学,这所乡村学校由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1933年在淮安创办。陶先生的基本教育理念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以此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是中国式创造性现代教育的雏形。陶先生的导师杜威先生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强调“做中学”。陶行知敢于向权威挑战,他把杜威先生



的教育理论“翻了半个头”,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倡导“教学做合一”,并行生出乡村教育、岩洞教育等等形式,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论体系,为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开拓出一条全新的教育之路。他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积极投入到爱国救亡这所社会大学校中去。1933年10月10日,新安小学的14名孩子出发了。自此,中国大地上多了一支抗日救亡的小小的队伍,他们如一盏微茫的灯火,一路照耀,播撒火种。他们被毛泽东主席激励“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他们被习近平总书记赞扬“当年,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新安旅行团’不怕艰苦,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宣传党的主张,展现了爱国奋进的精神风貌”。本书引言部分写到的几个“今天我告诉你”特别让人感动和震撼。新安旅行团的团员们创造了一个时代的传奇。看到这无数的“第一”,我想我们必须重新估量我们曾经淡忘、忽略和漠视的精神以及塑造这种精神的创造性教育理念。这种理念对于当下的应试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新旅的辉煌成果是中国式创造性现代教育真诚的、丰饶的典范,作者把这种思想和精神进行提炼并加以阐释,新旅精神没有过时,它依然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时代精神。在那个战火频仍、国破家亡的年代里,他们捍卫民族尊严,传承中华文化的根脉。他们的身影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风骨和品格,也让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侧耳倾听来自历史天空的绵延不绝的回响。